



“历史终结论”可以休矣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¹

编者按：不久前，美国保守派谋士沃尔特·拉塞尔·米德撰文批评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指其迷信自由主义一统天下的“历史终结论”，忽略地缘政治威胁。他强调美国必须制定完整的战略，把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个挑战现存秩序的“中央国家”围堵在欧亚大陆之内。米德的文章反映了美国部分国际政治学者的战略设想，可能会在美国的学界和政府部门中引起一定反响，甚至预示了美国战略调整的可能方向。最近日趋激化的乌克兰局势，可能给米德等保守派人士的战略建议增添更多论据。特予以摘译推荐。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第一次需要通盘考虑对欧洲、中东、南亚和东亚的政策，采纳一项完整的欧亚战略。

多年来，一个大国联盟一直试图挑战美国及其盟国在冷战后建立的欧亚秩序；2013年下半年，这个“修正现状者联盟”（revisionist coalition）开始站稳脚跟。组成这个联盟的是俄罗斯、中国和伊朗，可以称之为“中央国家（Central Powers）”。他们尽管彼此仇恨、疑惧，但在西方规范和价值观对其政权的致命威胁下，结成了一个地缘政治上的“象鼻虫轴心”（axis of weevils），对以美、欧、日为中心的“海洋国家联盟”（Maritime Association）构成严重的挑战。眼下他们还缺乏正面对抗现存秩序的力量，只是企图从薄弱环节入手，一步步侵蚀美国和其他海洋国家建造的权力大厦。

¹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 Mead）是前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本文原文发表于 The American Interest 网站，
<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wrm/2013/12/02/2013-the-end-of-history-ends-2/>。此为中文摘译版。

一个不可思议的秋天

2013年秋天，组成“象鼻虫轴心”的三个国家正在庆祝他们的巨大胜利。伊朗应该已经乐昏了头。尽管白宫和支持其政策的媒体都试图将美伊核谈判描绘成一场成功的交易，但他们无法掩盖伊朗在谈判中收获的巨大成果。华盛顿不仅把放松制裁作为临时协商条件，还在伊朗和其什叶派代理人在中东地区大行其道之时打开了扩展对伊关系的大门。正如奥巴马总统允许叙利亚用放弃化学武器的承诺换取了美国推翻其政权行动的实际终止，伊朗也相信自己可以用结束核计划的承诺换取美国放任其对“新月沃地”（the Fertile Crescent）甚至波斯湾的支配。这将成为全球均势的一个转折点，其结果已经显现：美国与盟国的关系趋向紧张，美国的影响力和声望遭到削弱。对伊制裁放松后，阿萨德和真主党势必获得更多的资金援助，伊朗也不会有所收敛。伊朗官方宣称将建造更多的核反应堆，包括更多重水反应堆。在这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战争中，美国事实上已经倒向了伊朗，这让美国的盟友和敌人都感到难以理解。

与此同时，普京总统正在庆贺一场自柏林墙倒塌以来俄罗斯获得的最大胜利。当乌克兰拒绝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议时，克林姆林官为其后发制人取得的惊人成果鼓掌欢呼。尽管俄罗斯周边的局势仍不明朗，但欧盟与基辅的协议本来可以破坏普京的国际战略，并打击他的国内地位。可是，欧盟外交的优柔寡断让虚弱的俄罗斯大占便宜。

远东的局势更加严峻。美国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的退让，看似体面合理，却让北京觉得华盛顿的“重返亚洲”战略只是大话，而非真正的政治意志。中国认为，奥巴马政府和美国民众没有毅力去对抗东亚持续增长的外交及军事压力。如今中国不仅在新宣布的东海防空识别区部署更多军用飞机；据传中国还欲在其他热点地区划定防空识别区。中国一再展示一种外交技巧，即拆分其战略，谨慎地追求各个目标，以便能将阻力减至最小，最终完成整个计划。这种精明的手法不仅令其对手应接不暇，还削弱了美国对其盟国作出安全承诺的意义和在亚洲建立对抗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的价值。事实上，中国在一步步奠定其“中央王国”的霸权基础时，采取了把进攻伪装成防守的策略，以便把开战的责任推到对手身上。中国领导人表达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的意愿，仅仅意味着中国将追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优势地位。如果事情果真如此，那么华盛顿的退让就正中北京下下怀，中国和其他国家会更加感到美国在亚洲的地位已经开始衰落。

华盛顿的短视？

在美国外交没有把握这场博弈的本质的时候，“中央国家”最能取得成功。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许多美国分析家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几乎所有高官都还没有觉察或读懂情况的变化。让美国人看不清局势的是以下三个因素。

一是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霸权习性。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衰弱的苏联和后起的挑战者皆难以与美国抗衡，美国人的注意力因而转向应对“特定问题”（如核不扩散、人权、恐怖主义、不平等、自由贸易等）和“棘手事件”（如伊朗、朝鲜，以及基地组织这类虽会制造麻烦、却难以影响全球均势的非国家行为体），有关欧亚均势的大问题几乎从美国对外政策讨论中消失了。

地缘政治思维的消逝强化了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第二种倾向，即简单地用道德和法律的观念去处理国际政治。在弗朗西斯·福山写作《历史的终结》很久以前，美国人就已经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历史终结的时代，他们深信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将使世界走上正道。在一个缺少重大地缘政治问题的世界上，律师和道德家们可以认为每一个问题都能单独地加以解决，他们只在乎巩固国际规范那样的抽象目标，不担心整个结构是否面临崩塌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把是否支持民主转型作为衡量对缅甸或埃及政策的基础，而不用太多地考虑令人沮丧的均势现实；利比亚也可以被当作一个人道主义和法律的问题，而非战略的问题；在伊朗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内外的人们所关心的是对核不扩散体制的法律规范挑战，或是对人权的道德挑战，而不是伊朗势力扩张的地缘政治后果。

最后一个因素是根植于美国知识文化中的乐观主义。受困于两场对外战争带来的损失和风险，并出于将资源从国防转向国内问题的愿望，美国政府内外的许多分析家提出了一种温和的现实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美国可以安全地从欧洲事务中完全撤出，同时放手绝大部分中东事务，只作为“离岸平衡者”以较小的代价维护美国的利益。这种观点似乎引领着当下的美国政府和一部分来自右派的新孤立主义者，其假设是：一个适度温和的后美国时代的均势潜藏在国际事务的结构中，如果我们让开它就会显现出来。这样的观点缺乏历史证据。18世纪的离岸平衡者——英国，在1689至1815年间近乎持续不断地同法国发生战争。“和平撤退”的观念忽视了一个现实，即世界上存在敌对的、以及在我们看来具有破坏性的力量，他们会伺机用极其令人反感和危险的方式改造这个世界。人们越来越怀疑，伊朗、俄罗斯和中国不会因为美国的撤退而节制他们的野心或改

变他们挑战现存秩序的意图。在我们淡出舞台而他们却沉醉在大获全胜的迷人远景中时，我们的“以身作则”不可能让他们抛弃“零和”思维去拥抱“双赢”理念。

“历史终结论”的时代结束了，战略必须回归

无论本届或下届美国政府，都必须以另一种视角看待国际政治。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第一次需要通盘考虑对欧洲、中东、南亚和东亚的政策，采纳一项完整的欧亚战略。我们必须在地缘政治的背景下思考诸如核不扩散、民主发展等问题；我们必须把修复和保卫同盟作为首要任务。

我们越早完成这种政策转变，处境就越有利。“中央国家”之所以如此逞强，主要是因为美国至今还没有认真地采取反制政策。我们如能诉诸清晰的思维和谨慎的行动，就可能以低廉的成本扭转不利的地缘政治趋势；如果我们坐失良机，那么未来的情势将变得更加艰难和急迫。

（刘冠甫摘译，归泳涛校）